

有关朝贡体系概念的批判性认识

金永镇(国民大学)

I. 绪论

最近,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将给国际政治秩序带来变化。一些人提出,中国有可能作为霸权国家不仅有替代美国,而且将给国际秩序的规则或规范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对新的国际秩序,虽然出现各种“剧本”(scenario),其中最有力的论据就是传统时代的经验。传统时代的经验无他,就意味着近代之前在东亚长时间维持下来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差序秩序。它与以实力均衡为特征的近代以后西欧国际秩序形成对比。根据如何理解历史经验,对今后的东亚国际秩序,将提出截然不同的政策构想。

对东亚国际秩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或理解,可大致提出如下几个特征。其核心,就是通过中国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差序以及通过此体现出的和谐秩序、经济互惠性等。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朝贡体制度,就是体现这一天下的秩序的一种方式。可以理解为,周边国家也积极参与这些体系之中。就是说,朝鲜等周边国家,依托中国和朝贡体系,谋求政治生存及经济发展。从法律来看,这与平等国家之间相互竞争为特征的无政府状态的近代西欧国家体系,有着明显的对比。(李云泉 2004: 314-322; Kang 2010, 592-599; 秦亚青 2006, 10; 王存刚·刘涵 2013, 151-155)

有关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观念,有时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相关的认识论依据。几位论者主张,虽然过去的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差序秩序,但它承认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自律性,故此与近代西欧国家试图的帝国主义膨胀或殖民统治等直接统治有区别。从这些经验的延长线上,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崛起并非是追求霸权,而成为一种和平方式。可以判断,周边国家也为牵制崛起的中国,比起与美国同盟或均衡政策,将会搭乘(bandwagoning)中国车(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2010年, 375-793, 512-520; 이삼성 2009, 217-227)。实则不然,通过中国的优越地位,也可实现东亚稳定。这一意义来看,也有主张更加靠近所谓霸权稳定论(hegemony stability theory)(강정인·이상익 2015, 197-201; 박홍서 2010, 13-15)

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关注,虽然从中国的崛起出发,同时与原有国际政治理论的批判连在一起。这是从近代以前的东亚国际秩序,试图构筑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原有的国际政治理论

被现实主义以及其变形的结构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所支配。现实主义把国际政治视为无政府状态，即为从个别国家的立场上，**上位**权威得不到承认。从这意义上来看，可理解为主权国家的权利关系。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的近代国际体系的三个特征：第一，其组织原理是无政府状态；第二，其组成员国家，作为未分化的同单位来发挥其功能；第三，国家之间不均衡的权力分配（肯尼思·华尔兹，2000年，**전재성** 2011，54）。

变形形态的霸权稳定论，关注国家之间的现实性国力差距，特别是通过霸权国家而成立的差序国际秩序（이무성外 2008，65-73）。

对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的讨论，对近代西欧的国际秩序或基于此的现实主义理论提出反论。因此，东亚国际秩序的特征，比起依据严格的实证，有可能存在只过度凸显与现实主义不同之处可能性。同时，结构主义变形形态来被收容，强调对周边国家的差序秩序的自发参与以及因不平等地位而进行的**内在收容**、共享如儒教的社会伦理一样的规范或价值、相互理解等。同时，还存在注重如同朝贡制度等外在关系的倾向。

其实，就像近代西欧的国际秩序，东亚国际秩序根据视觉也存在不同的解释余地。与此相关，大体提出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朝贡体系概念果然能够正常体现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第二，与朝贡体系有关的几个功能的评价，是正当的吗？比如说，朝贡制度是由大国的军事性、政治性而进行的强制性结果？还是内在的收容结果？要不，搭乘大国之力，守护本国安全的战略应对？朝贡是对朝贡国的剥削？还是经济、文化的恩惠？朝贡是否保障了传统东亚和平秩序？尤其是，根据时期或地区，朝贡的方式或被贯彻的程度有没有差异？

从这些整个来龙去脉来看，这篇论文将以批判的态度浅析中华国际秩序的核心概念——与朝贡体系相关的几个争论焦点。结尾部分基于前面的分析，对今后国际秩序重组相关，指出朝贡体系概念的问题以及限制。当然，对个别问题很难找出正确的答案。这不仅是在小论文上可以做到的，又是超出笔者能力范围的。只是想，多方面提出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同时，欲求呈现出东亚国际秩序如同中华秩序或朝贡体系，不能以一个概念来使之简单化乃至千篇一律化，是一个非常动态的实体。与此同时，将指出原有的东亚国际秩序相关谈论，虽然其意图或目的不同，但从内容上还没有摆脱基于东西二分法的西欧对亚细亚的视觉。归根结底，想要提出：今后在构筑国际秩序时，为提高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理论、实践价值，比起历史事实，应更加严密地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II. 朝贡体系的登台

对东亚国际秩序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最普遍化的也许就是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

1941年，美国历史学者费正清(J. K. Fairbank)首次有体系地阐述朝贡体系。根据他的说法，朝贡就是帝国将优越的经济优势，为保障自身安全的经济目的来使用的一种手段。即，周边国家为享有中国很高的文化优惠，承认中国所要求的中国的政治优势。其结果，形成周边国家向中国皇帝朝贡、受皇帝册封等差序秩序(Fairbank 1941, 137-141)。后来，费正清把东亚国际秩序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把它看成高水平农耕文化、整体的文化统一性、社会差序结构、作为天下支配者全知全能的天子、道德规范、和谐、人格以及官僚支配的结合等中国国内特征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向国际社会扩大的结果。中国与其周边国家之间构筑的朝贡体系到明清时期，其主要内容包括：册封周边国际领导人、使用中国式年号、朝贡地方特产、皇帝的回赐、对皇帝的磕头、在国界与首都所进行的部分交易等(Fairbank 1968, 4-11)。

另外，有关东亚国际秩序，特别是在亚洲圈备受瞩目的理论，就是六十年代初由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他说，东亚世界通过册封这一独创的政治结构，构筑了有机而统一的秩序。即，中国皇帝通过册封，与周边诸国首长形成君臣关系，并通过此形成东亚世界这一单一文化圈。

西嶋定生对朝贡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他认为，朝贡体系是汉代(BC 202-AD 220)开始部分出现，但三国时期(220-280)和魏晋南北朝(425-588)的分裂开始正式形成，到隋唐时期得以完成。册封体系特别是上述的分裂时期，即3-5世纪才开始进入制度化局面。此时，韩国、日本等地，一些自立国家得到成长发展。这些国家一方面在抵抗中原国家的攻掠过程中，实现政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中原国家也相互竞争，有必要确保国际正统性以及同盟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国家与各不相同的中原国家形成册封关系(西嶋定生，2008, 60-140)

那朝贡(册封)体系理论是在何等背景下被提及的？首先，费正清认为，西欧进军亚洲与清朝相遇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独特的外交惯例开始。英国使节团 Mccartney以贸易为条件，让他朝贡并要求给皇帝磕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不过，他的相关论文是1940年代初期写的，因此有必要看另一方面的。当时，在欧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向原有的国际秩序挑战；在东亚，日本迫使中国陷入困境。特别是，中国的投降或崩溃给日本更多自由，使情况更加恶化的可能性非常大(孔华润，Warren I. Cohen, 2009, 399-406)。在此情况下，一些人欲求凸显在东亚的中国历史地位及角色。数年过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对日战中没有起到特别的作用，但美国让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与战后协商。

西嶋定生的册封理论的出现，也具有一定的情况背景。1960年代，日本比较关注回归东亚。当时，欧洲很多国家对亚洲扩大其经济、政治影响力。相反，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故被疏离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就像德国通过欧洲共同体回归欧洲一样，日本也有必要将自己视为东亚的一部分，恢复自身形象（김성규 2009, 153）。同时，册封理论在东亚具有凸显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双方对峙格局之意。具体来讲，他强调日本（维持与中国的交往及文明的收容）作为其前提条件，至少6世纪至15世纪为止，脱离了中国向其他周边国家强制推行的册封体系。同时，他主张：到6世纪以后，日本以册封体系逻辑把百济和新罗当做隶属于自己的国家（西嶋定生，2008, 166-177）

最近，中国国内研究人员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以藩属体系来表现的情况较多。在藩属体系上，周边国家如同军队或为管理而驻扎一样，虽然并非是被帝国受直接支配，但很明显的是以隶属于帝国作为前提条件。例如，帝国对周边国家以“藩臣”、“外臣”，承诺统治地区及义务；派使臣下达政策，拒绝时使用军事惩罚等手段。周边国家不仅隶属于帝国，为防御帝国设藩屏，即“藩篱”。朝贡体系被看作是藩属体系的重要的一部分（李大龙 2006, 3-22, 45-50；黄松筠 2008, 3-17）。

一旦形成理论体系，它依据一些文献上所出现的类似的个别案例或现象，追溯到历史初期。其代表性的见解，就是历史初期西周时期的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封建主仆关系，到春秋战国时是弱国被强国的政治从属以及经过秦汉统一帝国逐渐向世界扩展。从这一角度来看，朝贡制度起源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770年）（李云泉 2004, 1-24；이춘식 1986, 2-84；李大龙 2008, 1-10）。

朝贡（册封）体系作为体现东亚国际秩序的概念，被很多研究者被收容。当然，对它的定义或理解各不相同。例如，朝贡体系是对国外使节的礼仪以及支撑它的规范，由中国考案而实施，是对外管型上的官僚管理制度（李云泉，2004, 189-222）；它是为东亚国际社会的合作而出现的共同原理乃至规则，即儒教文化、等级制的组织以及像礼节一样的程序等（zhang 2001, 52-53）。韩国历史学界全海宗关注，朝贡体系作为强国对弱国的统治形态其政治重要性（Chun 1968, 110-111；Wang 2013, 209-211）。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滨下武志主张所谓的朝贡贸易体系论，强调朝贡的重要性在于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易之中（滨下武志，2013, 송한용 2015, 238-242）。

II. 朝贡体系的现实

对朝贡体系可以如下几个批判的态度来浅析。首先，与朝贡体系起源相关的问题。从时期来看，中国统一之前不能与周边国家设定国际关系，所以很难与西周的封建制度与朝贡体系连接在一起。西周时期的封建制度是天子给诸侯分割并围绕领土来统治，即意味着分封；而后代的朝贡体系批准或承认当地权利者的统治正当性，即册封。

因此有些人主张，汉朝一方面重新引进秦朝废除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时期就大举征服周边地区，包括郡县化等，以各种支配方式之一引进朝贡体系（김한규 1982, 133-150）。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调查，到统一国家汉朝，朝贡并非是一次性而频繁发生（全宗海 1973, 8-12）。

第二，片面的朝贡行为或赋予从属称号作为国际秩序，应与朝贡（册封）体系区分开来。从朝贡起源可以看到，访问他国或送礼等外交行为具有很长的历史，而且在同等级位的国家之间也存在过这些行为。同时，国家之前上下关系也存在。例如，在东亚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可视化的前汉时期，南越和朝鲜被设定为外臣。但是，两者之间没有对王的朝见或朝贡、皇帝的册封等具体的程序。展开大规模征服活动的汉武帝，追求的并非是对所属地区或民族的朝贡关系，而是直接统治，即郡县支配。只是，汉武帝时期的帝国领土达到可以郡县支配的最大范围，此外是能是一个间接方式支配（金永镇 2015, 343-350）。朝贡关系是对其的对应方式之一。当然，它要发展成国家之间的制度乃至国际体系，需要更多的时间。

实际上，帝国对周边民族不仅是朝贡关系，还采取了各种直接、间接的支配方式。例如，汉朝时期，与周边民族采取道、属国、都尉、都护、校尉等各种形态的支配方式。比起一定的秩序观念，以权力或统治费用等现实逻辑来支配（金永镇 2015, 329-342）。这些传统持续下来，直到最后的王朝清朝，除了单纯的朝贡关系之外，还有给当地统治者赋予帝国官职来支配的土司，以及中央派遣一种监督官进行管理的藩部等制度，形成一种多层支配结构。

因此，对个别地区的支配方式也带有可变性。初期，周边民族与租税或徭役无关，只是一个简单的朝贡来与帝国连接在一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成为帝国行政体系的一部分。虽然一段时间允许有当地人负责地方官职，但是历代中原政府逐渐由中央派遣的官吏来替代地方官职，扩大直接统治的范围（改土归流）。

这些整个变化过程，说明朝贡体系作为差序权利关系的一种形态，其具体内容根据时期或地区各不相同，故随着权利关系的变化其主从位置也有变动。各国都想行使最高主权。越南或朝鲜等国家对帝国称王，但在国内使用皇帝称号。相反，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也不断试图摆脱其直接统治，构筑独立的政治体系。其实，朝贡体系概念出现近代国民国家体系之后而出发，因此再不把期间编入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国际政治行为者来考虑。

第三，在朝贡关系上，中华与夷籍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关系。中华与夷籍的交替，即华夷变态以各种方式出现。更重要的是，北方民族利用机动力强的骑马兵征服中原，试图改变中华的中心势力，一些也得到了成功。中国的知识界人士中，也有强调华夷变态。特别是，他们通过异籍的中华化可能性，使中国的失败合理化，进而可以鼓吹中华的文化连续性。也有一些夷籍自命为（小）中华。这些在原有的中华相比，出现更加强烈的新夷籍而被灭亡，而后者还没有构筑中华秩序的情况下出现的。例如，明清权利交替的情况下，朝鲜自认为自己

是已灭亡的中华继承者，抵抗清朝。

也有把朝贡关系视为一种“中国”特征的倾向。所谓“中国式”是指“汉族”这一特定的民族呢？还是统治中原的“政治组织”有关系呢？无论如何，其实体带有可变性。例如，中原的北半部历经被北方民族支配250年以上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相继出现的隋（581-617）、唐（618-907）、宋（960-1279）与汉（BC206-BC220）的种族不可视为同一个种族。明朝（1368-1644）历经被契丹（辽，916-1125）、女真（金，1115-1234）、蒙古（元，1279-1644）等不同民族持续支配之后登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满族将近270年维持的清朝（1644-1911）遗产。对此，一些人称它为少数征服民族的中国化，但把它视为中国内在结构发生不少的变化更为现实。。

在了解传统东亚国秩序时，从其他方面可以更多看出没有充分考虑北方民族的作用。其实，如今大部分都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对他们的研究很少。但是，帝国的对外政策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紧密联在一起。中国帝国持续不断地与游牧民族竞争，而且如上所述在中原频繁建立征服王朝。虽然一段时间两者之间也存在过朝贡关系，但是大部分处于敌对关系（Kang 2012, 192）。他们几乎没有共享被视为朝贡体系的重要社会政治基础的官僚体系或儒教规范（MacKay, 2015, 58-59）。

第四，有必要瞩目东亚国际秩序的时期以及地区差异。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多级体系（Hui 2004），中世纪（4-9世纪）是势力均衡时期（Wang 2013），到近代初期（15世界中后期明朝建国）才形成差序国家秩序（Kang 2012）。中国处于分裂或被征服状态的中间——宋元朝时期是一种盟约体制，即被设定为多元国际秩序（Rossabi 1983, 225-229; 윤영인 2015, 165-170; 방향숙 2005, 67-166）。明朝和清朝也存在差异，前者的战略是基于儒教世界观的道德说服和防御、孤立主义的战略，而后者采取的是以依靠暴力的膨胀战略（MacKay 2015, 62-70）。据研究，中国和越南之间虽然维持差序关系，但其具体的情况来看，时期上存在差异（Womack 2012）。韩国或日本也如此。

与此同时，朝贡关系并非是只存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周边国家之间也存在过朝贡关系。例如：卫满时期古朝鲜附属真番和临屯地区，数千里威风远扬；统一新罗或高丽也针对耽罗、女真、蒙古等部族，形成朝贡关系。特别是，高丽利用元明交替时期的权利空白，附属女真部族接受朝贡；接下来朝鲜发动军事征伐并干涉明朝以军事行政单位而设定的卫所，即女真族部落。不仅如此，朝鲜对对马岛或琉球等，试图构筑朝贡体系（진상승 2014, 308-309; 정용화 2005, 83-85）。朝鲜对明清是事大，却对日本采取善邻（交隣）政策。壬辰倭乱之后，朝鲜与日本恢复邦交，发给日本的书函里没有使用中国年号。

日本一段时间针对中原国家形成朝贡关系，但到9世纪末至15世纪初以及16世纪末，再次断绝关系。之后，日本的幕府政权对琉球、吕宋（菲律宾的最大岛）、台湾高山国等试图设定

朝贡关系。其方式是只是通过去当地的商人传达相关国书，但对朝鲜实施军事征伐。对朝鲜的征伐失败之后，得势的德川家康希望“朝鲜朝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越南南部）、暹罗（泰国）、吕松、西洋、柬埔寨等蛮夷的君长和酋帅一个个没有不做的人”。（진상승 2014, 313）至少18世纪以后，琉球给清朝和日本将军定期派遣朝贡使节。10世纪后期，越南建立独立国家之后，与中国历代王朝正式建立朝贡关系，但面对自己周边国家希望建立朝贡关系。如此，朝贡体系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来展开。

第五，对朝贡体制论的前提，即是否共享一定的秩序意识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些人主张，朝贡关系是儒教规范向国际社会扩大的产物，不仅在中国在周边国家以观念来共有，在所属秩序内对各自的地位及角色具有一种自我认同感。从这一角度来看，朝贡关系超越组成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目的，是从内心的收容。与此同时，朝贡关系给他们提供国内外政治的正当性或权威的基础。其结果，朝贡关系不只停留在形式上的程序，被视为为东亚和平、稳定做出了贡献。（Kang 2010, 593-599）

只要东亚被视为一个国际秩序，组成员之间的前提条件就是共享对所属秩序的意识。实际在各种正式的文件中的外交修辞中，也可以确认这一点。同时，这些意识形成相互交流的程序与规范，并通过此减少国家之间机会成本及矛盾等做出了贡献。即便如此，意识或规范是已经形成的，即如果把它视为支配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巩固的结构是不行的。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一个本质因素。换句话说，它们也许只不过是一个国家之间实际权力关系的产物。

从理念和现实之间的悬殊的距离中，可以确认意识或规范的脆弱的基础。从朝贡体系的理念角度来看，帝国曾有过自身节制或反对对周边国家的攻掠吗？相反，以同样的理由，曾有过由周边国家抛弃能够征服帝国的机会吗？根据中原帝国的强弱程度，其统治的地理范围可变性也非常大，周边很多国家不经历过多次的存亡？游牧民族几乎没有共享天下秩序意识的余地。反而，朝贡体系从现实上不能对天下进行普遍支配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是一个对其粉饰或隐蔽的道具。就像朝鲜，已成为儒教化的朝贡国，在现实和观念之间也存在悖理。例如，从内心拒绝满族建立的清朝，而守护对明朝的信义（义理）的朝鲜，虽具有中华秩序意识，但其与清帝国的现实的上下关系相互冲突。

IV. 结论：现代涵义

到目前为止，被视为传统中华秩序基础的朝贡关系，以批判的态度类进行考察。朝贡体系是小国面向大国的自发性服从以及得益于大国的保护而形成的差序秩序，被视为为和平与经济交易的扩大做出了贡献。但是，东亚国际秩序以朝贡体系总结，非常复杂且具有动态性。帝国最大限度地追求直接支配，而朝贡关系只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根据地区或时期，国家之间

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北方民族经常否认中国的优势地位，有的国家拒绝朝贡秩序。那最后朝贡体制论与现代国际政治相关具有何意？

在绪论也已谈起，如今的国际政治讨论中，对其概念的关注从中国崛起这一现实出发。因为它作为应对目前西欧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一个应对方案。因此，对传统东亚秩序的解释，与中国崛起的方式、波及效果以及对其采取的国际应对战略连在一起。这一点也反应在一些研究之中。

首先，基于实力均衡的近代国际政治理论方面来看，中国的崛起包涵着原有秩序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意味着势力转移，即霸权国的交替可能性以及随之带来的矛盾。其例之一，就像一些人的提出，中国的崛起有可能损害国际秩序，即所谓中国威胁论。与此相反，朝贡体制论强调传统东亚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即，在近代以前的东亚，虽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差序，但维持了稳定而和平的秩序。故今后中国的再崛起，也将采取这种方式。

我们对中国的崛起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恢复直接连在一起的思维，有必要深思。天下体系只不过是21世纪中国为试图新的霸权而进行的谈论而已(Callahan 2012, 91-117)，与东亚现实大相径庭。东亚经历100年以上的近代化，以及最近的后现代化这一复杂的过程。其中，不管是任意还是被迫的，中国谋求向国民国家体系发展；近代国家的建设以民族认同感的形成、社会团结、对外形成自主与主权意识为主要内容，而且目前正在建设形成之中(秦亚青 2006, 10-12)。这些经验，相当多的部分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背道而驰，因此今后有可能不会反映在新的国际秩序之中。

此外，应考虑东亚国际秩序与全球国际秩序的关系。当然。不能否认传统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非对称结构，但是它作为一个说明如今或未来国际关系的框架，也意味着东亚谈论的结构限制。从周边国家的立场来看，参与东亚体系时有很多不同的依据与方式，如同北方国家所做一样，包括对中心的抵抗甚至也支配过。历史学对其相关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国际关系的讨论上，其没有受到瞩目。尤其是，从如今的周边国家角度来看，东亚像过去一样没有封闭，与上位的国际体系连在一起。美国、俄罗斯、印度、欧洲等不少国家，在全球进行激烈的竞争。

当然，中国的崛起也可不改变国际秩序的框架或规范的方式来进行。就像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 Ikenberry)所提到一样，中国可以替代美国，但它不一定是一个改变国际秩序规则的方式。从他的立场来看，如今美国主导的的西欧国际秩序是基于开放性和包容性、联合性格的领导能力、国家主权和法治等规范，而且中国也在这些国际秩序内受惠并崛起的。因此，美国必须要扩大目前的国际秩序并予以制度化，使崛起的中国留在其秩序内。此时，美国的地位可能会削弱，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持续维持下去。(Ikenberry 2008)

归根结底，中国的崛起以及与此伴随的国际秩序的变化，依然在进行之中。对传统东亚秩序的讨论，因现实要求而被提起，同时受其影响的可能性也很大。实际上，对东亚国际秩序的

具体内容或它的现代意义，目前提出非常不同的观点。这种情况下，理论有可能被现实要求被隶属。为从过去的经验中导出正确的政策或战略，比起历史事实，应进行累计客观研究以及基于此的讨论。

【□ □ □ □】

- 권혁수. 2012. “청일전쟁 당시 청군의 조선출병 과정 및 그 목표의 변화.” 한국정치외교사학회 편. 『한반도 분쟁과 중국의 개입』. 서울: 선인.
- 김성규. 2009. “미국 및 일본에서 ‘傳統中國의 世界秩序’에 관한 研究史와 그 특징 비교.” 『역사문화연구』 32집, 147-182.
- 강정인·이상익. 2015. “유교적 국제질서의 이념과 그 현대적 함의.” 『한국철학논집』 47집, 171-206.
- 계승범. 2009. 『조선시대 해외파병과 한중관계』. 서울: 푸른역사.
- 김영진. 2015. 『중국, 대국의 신화: 중화제국의 정치토대』. 서울: 성균관대학교 출판부.
- 김한규. 1982. 『古代中國の世界秩序研究』. 서울: 一潮閣.
- 니시지마 사다오(西嶋定生) 지음·송완범 옮김. 2008. 『일본의 고대사 인식: '동아시아 세계론'과 일본』. 서울: 역사비평사.
- 마틴 자크(Martin Jacques) 지음·안세민 옮김. 2010. 『중국이 세계를 지배하면』. 서울: 부키.
- 박홍서. 2010. “내재화된 위선?: ‘중국적 세계질서’의 현실주의적 재해석.” 『國際政治論叢』 50권 4호, 7-27.
- 송한용. 2015. “하마시타의 조공시스템론을 통한 “아시아교역권”론에 대한 재론(서평: 浜下武志 著. 『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東京: 岩波書店, 1997 (2013 재판)).” 『용봉인문논총』 47집, 233-252.
- 워런 코헨 지음·이명화 정일준 옮김. 2009. 『세계의 중심 동아시아의 역사』. 서울: 일조각.
- 이무성 외. 2008. 『국제정치의 신패러다임: 존재론, 인식론, 방법론적 고찰』. 서울: 높이깊이.
- 이삼성. 2009. 『동아시아의 전쟁과 평화』 1, 2. 서울: 한길사.

- 전해중. 1973. “漢代 朝貢制度에 대한 一考察 - 〈史記〉・〈漢書〉를 통하여-.” 『東洋史研究』 6집, 1-13.
- 진상승. 2014.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전통적 국제질서에 관한 몇 가지 문제.” 『한중인문학포럼 발표논문집』 (2014. 12), 301-326.
- 케네스 월츠(Kenneth N. Waltz) 저·박건영 역. 2000. 『국제 정치 이론』. 서울: 사회평론.
- Chun, Hae-jong. 1968.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0-111.
- Fairbank, John K. and S. Y. Têng. 1941.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No. 2, 135-246.
- Fairbank, John K. 1968.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9.
- Ikenberry, John G.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Jan/Feb.), 23-37.
- Kang, David C. 2010.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9, No. 4, 591-622.
- Kang, David C. 2012.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C. 201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East Asian Histor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3, No. 2, 181-205.
- Kissinger, Henry. 2012.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http://www.henryakissinger.com/articles/fa0412.html> (검색일: 2016. 4. 15)
- Lee, Ji-Yong. 2014. “Hisotoricizing China’s Ris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Asia.” EAI Working Paper.
- MacKay, Joseph. 2015. “Rethinking the IR theory of empi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5, No. 1, 53-79.

- Wang, Yuan-kang. 2013. "Explaining the Tribute System: Power, Confucianism, and War in Medieval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3, No. 2, 207-232.
- Womack, Brantly. 2012. "Asymmetry and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37-54.
- Zhang, Yongjin. 2001.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NO. 5, 43-63.
- Zhang, Feng. 2009.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Broadening the Conceptual Horizon of Historical East Asian Politic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2, 597-626.
- 李大龙. 2006. 『汉唐藩属体制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云泉. 2004. 『朝貢制度史論』. 北京: 新華出版社.
- 王存刚·刘涵. 2013. "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 『国际安全研究』 4期, 145-155.
- 秦亚青. 2006.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 『世界经济与政治』 3期, 7-13.
- 浜下武志. 2013〔1997〕. 『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東京: 岩波書店〔2013 再版〕.
- 黄松筠. 2008. 『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n the 'Tribute System', a Core Concep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raditional East Asia

Kim, Young-Jin (Kookmin University)

With the rise of China the tribute system is increasingly gaining attention. The tribute system, defined as a hierarchic order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such elements as ethics, hierarchy, harmony, mutual interests, peace etc.

The paper argues, however, that the pre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was too diverse and dynamic to be covered just by the tribute system. It was only one

of the many types of governance implemented by the empire. It varied from states to states and from time to time. Some countries negated the system totally. Moreover there was a big gab between the concept and the reality. An alternative, star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East Asia, to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order presupposes an in-dept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reality.